



二日不幸染上外間的嚴重流行感冒，轉為肋膜炎，肺部生病，先後在南德與瑞士的森林山中休養，受肺充氣治療。病尚未痊癒，父親已趕回柏林，不幸在當時遭受納粹壓迫為難的困難環境下，病疾復發，只有請假回國。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父親獲准後，由義大利乘船，回到上海。正值盛夏溽暑，醫生介紹到杭州莫干山小住。年近七十的祖父特地前往上山探望，接父親回鄉休養。休養期中，父親曾翻譯兩本專門書籍（註④）父親翻譯的兩部書是宋巴特所著的「德意志社會主義」，及艾立舒（Eugene Ehrlich）的「法律社會學之基礎」。父親身體復原後，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回到外交部工作（註⑤）這段經過，父親在「古希臘哲學家陳康」上集《中外雜誌八十七年十月號》六二、六三頁有詳細的敘述。該文中又提到另有一文，三十年前刊登在中外雜誌，其中亦有與這段時間有關的事情，可惜那篇

早文我無法見到。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在北平近郊的蘆溝橋發生，日軍迅速南下，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父親隨著外交部撤退。在重慶父親由友人介紹認識了母親。母親彭樹杞是武昌聞人彭晟（薛青）之次女。外祖父曾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為其秘書。母親不但高雅賢淑，知情達理，而且是南京金陵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高材生，受過高等教育，為同齡女性所不多見。民國二十八年四月，父親與母親在重慶的戰火中結褵。

婚後不久，父親奉派古巴。五月他與母親由四川後方經過貴州雲南先去越南，再到香港，從那裡搭船往印度洋，經可倫坡再入紅海，穿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而到馬賽港。到時歐戰已經爆發，不能登陸通過法國，只有繞葡萄牙海道去英國，在利物浦等船。九月底冒險橫渡大西洋，先抵波士頓，然後換船到古巴，上任三等

秘書，遙遙走了大半個世界。兩年後任滿，父親無意再繼一任，遂於民國三十年夏與母親帶了在哈瓦那出生才一歲多的哥哥先到洛杉磯，在那裡等船，由於太平洋情勢緊張，船隻已少，兩、三個月才等到一艘荷船，繞道到菲律賓，經香港回到重慶。珍珠港事變就在那年年底發生。

民國三十二年初，部務代理未經父親同意，逕派他去蘇聯，在答應一年內返回的情形下，父親獨自由重慶經迪化到達歐瓦河畔的庫布契夫任職。半年後史大林遷都，父親又去莫斯科。直到民國三十四年一月，才得以回到重慶，當時中國國際聲勢微弱，難為外交人員。父親回來後，便辭去外交部職務，立刻即應蔣復璁館長之邀，前往國立中央圖書館任職。八月日本投降，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父親有機會先行回京，才得回到楊灣鄉去探望八十歲的祖父，唯不幸祖母已於戰中病逝。（註⑥）父親這次先到南京

是因為由那裡去北平，準備去哈爾濱，協助接收（見後）。結果不成，再回南京。當時江北一帶仍有共軍與土匪會合的土共之擾。父親小心繞道宜寧，才得回到楊灣鄉。只留了十天，土共已入後莊，父親又繞道經汪精衛手下控制區，才得回到南京。

（民國三十五年，父親雖已離開外交部，但因通俄文，被請去以參事名義接收哈爾濱，協助市長、局長處理與俄人有關的法律事件。後因赤俄將武器交與共軍，接收不成。幸由市長安排，及時乘小飛機撤出，飛往瀋陽，再經北平回到南京。同年父親以三十七歲英年受任為經濟部司長（註⑦）哥哥記得父親曾任商業司與國際貿易司兩個司長，先後次序則不知），當時部長為王雲五。次年五月，父親再度還鄉探望祖父，這次與母親帶了六、七歲的哥哥，及二歲半的我同行。民國三十七年，共軍由北逐漸南下，國民政府幾經改組，於年底遷都

廣州，蔣總統下野後，在台灣復起，組織新政府，母親、哥哥、初生一個月的妹妹和我都先隨外祖父母及姨舅們相繼來台。父親又獨自隨政府到廣州。三十八年初，新任經濟部長準備與中共合併（註⑧）此部長為孫越琦，其人與資源委員會的吳兆洪二人策畫參加所謂「講和」內閣。「陳康」文上集（見註⑤）六四頁與「回憶胡適之先生文集」第二集（李又寧女士主編，一九九七年紐約天外出版社）一九五頁均提及。後者文題為「我為胡適之先生服務的經過」。父親幸於五月底尋到一艘貨船，由廣州經香港到達基隆，與我們相聚，得以脫離單獨留居大陸，遠離家人之境。

### 從事文教遠離官場

父親到台灣以後，決定不再任公職，也就未回歸重組的國民黨。民國三十八年，傅斯年到台灣，將日據時代的台北帝國大學改為國立台灣大學

，加以整理，正在招攬學人，擴充校譽。於是傅校長聘請父親為法學院教授（註⑨）父親雖然一直在商學系，但好像早期與經濟系也有密切關係。至於在四十二年前後曾短期任商學系主任，是我看了萬又煊先生的文稿才知道的。父親慎重地花了整個夏天，在法學院圖書館查閱由校本部撥來尚未排整編目的書籍文獻，編成詳盡的講義，以備秋季開學授課。父親開了好幾門課（註⑩）父親教的課，我記得主要的是一「貨幣銀行」與「國際貿易」基本課程。另外萬先生提到的有一「動態經濟」與「宋巴特思想」等專題課程，並指導學生研究論文（註⑪）父親學生眾多，出色的大概也不少，可惜我們知道的不多，席裕英、郭婉容、薛天棟、何清益、蔡星平是我記得的幾個早期名字。萬又煊先生則是父親最傑出的學生，不但與父親關係最深，而且後來至美深造任職，成就卓越。（註⑫）萬又煊先生對父親在

台大執教初期的事蹟，比我們清楚得多，在前文「悼念楊樹人教授」文中有周全的敘述。）父親雖以整體的社會經濟理論見長，這是當年留學德國的影響，但他的數學基礎也不錯，所以後來西方流行計量經濟學，他也是首先將其納入教材者之一。這一段時間，父親除了翻譯了一些英語、德語的書籍，並有幾本專門著作（註⑬）我們無法搜尋父親譯著的全部書目，就所知的舉幾個例，民國三十八年，父親應王雲五先生之囑，替華國出版社翻譯了一本「史大林與其同僚」之書。此書在十年後還有一段事故，父親在「回憶胡適」二集（見註⑧）中曾提到（二二〇頁其註⑯）。另外記得見過一本叫「經濟常識」的小書本，是父親寫的，也是華國出版社印行的。至於專科書見過的有「貨幣與銀行」、「國際貿易理論」等，也都是父親的著作，另外還譯過宋巴特「論人」( Vom Menschen ) 的兩個章節。

（父親在台大任教兩年後，小妹出生。）父親在台大任教的初期，由於過去的業績，以前的上司或同仁時常推薦父親當某些職位的人選，包括一次外交部的斯頌西推薦父親為大使，另一次張之闓任經濟部長，曾考慮父親為商業司長。其實父親已安於教職與從事學術研究，不再有興趣於其他了。民國四十四年，父親赴美一行，到各地訪問講學，會晤居於美國的經濟學名士（註⑭）雖然提前了一年，算作教授每第七年的休假期（sabbatical）。我不記得父親到過些什麼地方，只記得柏克萊（Berkeley）的張伯倫（Chamberlin）對父親的言論十分讚賞。（朱家驊先生推薦父親回程到德國考察。當時行政院陳誠院長對德國戰後經濟之迅速復興甚起注意，曾派人前往。朱家驊認為父親是學經濟的，觀察較為切實。父親去後，曾花一週書寫報告，並在柏林電台為台灣宣揚。中央研究院在台灣復院後，朱家

驊院長於民國四十五年底邀請父親擔任總幹事。父親以繼續台大教職的情況下，答應服務九個月。此時傅斯年已於三十九年逝世，錢思亮為台大校長。父親在總幹事任內，又被評議會選為秘書。四十六年暑假前後，朱院長因事辭職，在交接中，父親只有繼續盡秘書之責，於十一月召集評議會，選舉三個候補人。會議次日，蔣總統圈選並特任胡適先生為院長。去開台。民國四十七年四月，胡適由美回台上任中研院長。交接完畢，父親辭去總幹事職，唯評議會秘書未能辭去。往後不但被補選為評議員，而且在胡適創辦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時，又由朱家驊與胡適將父親勸就該會執行秘書。如此父親就拖著不甚健康的身體，為胡適服務了三年多，同時並建立了深厚的交情。直至民國四十六年六月，終於尋著徐可燦繼任，而辭去職務。父親於暑假去陽明山中小住，休養身體，準備九月開學。但九

月底中研院總幹事出缺，胡適找父親商量，父親鑑於胡適亦任重體恙，雖不願再接此職，但答應再度協助，每週去南港三個下午，處理院務。五十二年二月，胡適不幸在院士會後招待記者中心臟病發作而逝世，父親在場親睹，並曾臨時處理應急事情。眼見巨星隕落，卻也無法挽救，悲愴悵惘，心中若失（註⑮）這段在中央研究院的經過，父親在七十六年中外雜誌刊登的「胡適書信一束」（八月號一七頁及九月號四五頁上下）及「回憶胡適」二集一文（見註⑧）中有詳細敘述。前者亦曾納入李又寧女士主編的「胡適與他的朋友」第四集。

首次胡適去世後，父親參與了一些有關的事宜，例如胡先生的葬禮，胡適紀念館，及胡夫人的安排等事。往後雖繼續為成立經濟研究所而效力，已不再在中研院正式任職，而專心在台大教學與研究。父親在中央研究院有兩個重要貢獻，其一是前面所述國科會，這個組織原是由吳大猷在朱院長時期提議的，到胡院長時行政院經費撥下，得以成立，由中研院的評議會與教育部聯合負責。父親是國科會第一任執行秘書，所以花了許多精力為其奠定基礎（註⑯見「胡適書信一束」）（註⑮）一文中二一至二二頁上胡先生五十年六月十三日信）。其二是經研所，創立此所也原是朱家驊院長的計畫。因為經濟是父親的專學，遠在父親到中研院之前，朱家驊已要父親籌畫，後來胡適繼續催促此事（註⑰同註⑯二二頁末段）。父親屢次與蔣碩傑、李幹及邢慕寰諸先生會談，後來此所在王世杰院長任上成立。

自我有記憶以來，父親經常穿著藍布長衫，出門總是走路，乘公共汽車，或大多騎腳踏車。就在五十三年春的一個雨天，父親穿了雨衣，照常騎車出門，不幸被路側一個未修補而積水不顯的破洞絆倒，上腿受了嚴重的複骨折，發炎高燒，情況嚴重。後來在台大醫院進行手術，裝上不鏽鋼片，才能完成接骨。所幸保全了性命，但休養了好多個月，才慢慢能夠開始拄了拐杖走路。父親一向瘦弱，由於這個事件耗了許多精力，就更衰弱了，以至五十五歲即由台大提前退休。又一年後，父親體力逐漸恢復，南洋大學聘請父親為客座教授。父親又獨自去新加坡講學。往後的一兩年內，母親發現手足有局部麻痺的現象，然後逐漸擴散，以至於行動困難。在台北的醫生診斷無策的情況下，父親特地自學日語，陪護母親到東京去開刀診治。回來後母親的病雖然暫時稍有改進，但是長期下來仍無起色，終於在五十七年夏末去世，診斷為不治的側索神經硬化症（註⑱即是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美國也稱Lou Gehrig Disease。當時世界各國皆對此病瞭解甚少，近年研究得較多，甚至遺傳性的（大約佔病例的百分之十）基因幾年前已經找到

但治療仍是無方)。如此噩耗，全家自是哀慟萬分，父親更是深受打擊，罹病在身。當時兩個妹妹仍分別在大一及高一，父親乃辭去南洋大學講座。中國留學計，泯以飄然人五異狀。

### 生活儉樸讀書最樂

開代母親去後，父親留在台灣。後來應王雲五之邀，到商務印書館任總編輯，協助王先生編纂及出版各式書籍。(註⑱)我不清楚編了些什麼書籍，但見過王雲五先生的「人人文庫」叢書多本，大多包括範圍廣闊的古典作品，亦有一些海內外新作，以廉價多銷，廣及讀者為宗旨，大概是其中一部分)。同時父親也在台大與輔仁大學各教一兩門課。主要的是父親一面懷念母親，一面尊重母親臨終的囑托，悉心照顧兩個妹妹。大妹雖然一直住在台北家裡，小妹則後來到中壢去唸大學。父親每週去那裡教課時，總不忘帶了東西去看看她。這段時間哥哥

和我已來美唸研究所，父親不要我們分心，放棄了為自己事業與專門學問的最後盡力，全神兼代母職，慈愛溫和，填補兩個妹妹未成年而失母之痛。

○民國六十五年，我們兄妹四人都已先後來美，父親算是能夠真正地退休了。哥哥已經成家立業，迎接父親到洛杉磯。起先他只每年來一、兩個月，到加州與中西部看望散在各處的我們，其餘時間仍舊回到台北溫州街的老家。其後經我們一再懇求，不放心他一人在台，父親才逐漸增長留美時間，以至於在洛杉磯長住。民國八十二年秋天，父親應台大要求，回去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收拾書籍物件，然後把溫州街的房舍，還給了學校。(註⑳)父親在溫州街十八巷的房子，原是早年台大分配的，鄰居們皆是台大教授，許多都是父親的朋友或相識。例如對面的史學家吳相湘先生，以前常與父親在術堂裡談話，斜對面畢中本先生(農藝系主任)與父親為多年

好友，父親回去總是與他見面。另一方有周廣周先生(校務主任)，哲學家殷海光先生的寓所，即在巷口，出了巷子，溫州街近處有于景讓(植物系)、魏癩壽(化工系，中研化學所長)，遠一點有文史學家董作賓、姚從吾等諸先生，哲學家陳康先生，也只隔了一條街)，從此就只有將美國的寓所當家了。(註㉑)父親不再從事正式工作後，仍在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擔任董事(註㉒)母親去世後不久，父親曾短期於李幹先生為代主席時與此會有關。後吳大猷先生任主席時，張之闓先生推舉父親為董事)。該會由中美人士合組，審核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於成立清華大學餘下款項之用度。董事會每一年半開會一次，父親來美後，每次都回台參加，直至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往後因已近九十，年事太高，往返過勞，就無體力再回去了。董事任期則直到民國九十一年。(註㉓)

忘帶在日常起居方面，雖然住在熱鬧繁華的洛杉磯近郊，但父親保持他一向的簡樸生活。父親畢生勤儉刻苦，珍惜物資，素食淡飲，煙酒不沾，衣著樸實，起居規律，東西條理井然。

雖居於俗世，行止則有似高僧聖徒。來美後既不貪物質享受，亦不留意玩樂，甚至不出門旅行遊覽。除了繼續教誨勸導我們外，當孫輩仍是年幼時，他不厭其煩地協助照料與薰陶他們，為他們灌輸中外古今的傳統精神與正善思想。他們漸漸長大以後，父親則每日淨心起居，遠隔塵雜，只默察時局世事（註②）父親除了觀看電視新聞外，總是認真地閱讀「世界日報」，尤其往後聽力漸差後，更是仰賴這份報紙的新聞版。他總是特別留心台灣或中國的事情，所以雖然人在異地，卻不時心念祖國。坐讀臥思，修心養性。稍前至門外小院散步澆水，以為活動。往後坐行八段太極或只是靜坐養生（具無式）。賦性靈疎，全

本去父親的國學自然是根柢深固，在早年外交官時代，父親就精通英文與德文，並熟悉俄文、西班牙文及法文，加上後來的日語，總共知曉六種外國語文。有了這些語文為良好工具，父親能暢讀各種古今中外書籍雜誌，而有特殊的領會與心得。父親一向喜歡閱讀，他唯一捨得花錢買的是書（

註③）父親以前外交部同仁宋選銓先生之南斯拉夫籍夫人第一次到我們溫州街的小宅時，見傢具簡單，卻有兩個大書架，上面擺滿了父親的書。她竟用道地的中國話說：「書是楊先生的財產！」。遷移美國清理東西，把其他物件棄去，留下的還是精選的書籍。以前忙碌而時間有限，且專門書籍看得較多，真正退休後，尤其自八〇年代以來，得以隨興所致，廣泛閱覽，多係舊存，也偶有新購（註④）父親來美後，仍與商務印書館保持密切連繫，尤其與張連生經理書信往返。有時在商務新書目上見到特別的書，

曾請為代購。往後雖然眼力不如從前，還是戴起老花眼鏡，甚至持著放大鏡慢慢地看。除了書籍以外，有時見他「觀帖」（註⑤）記得我小學時有個夏天，看見父親攤開筆墨紙張練習書法，好像是臨趙孟頫的文天祥「正氣歌」。後來大概沒空，再很少見過

。晚年見他收集了一些字帖，以王羲之的居多，他說：「如果不能練字，多看看帖也是有好處的。」他這個喜好連美國長大的孫兒德生都知道，所以有個聖誕節他買了一本美國精印的中國筆墨書籍送給父親。父親不但書看得多，文筆也是十分流暢的，除譯著專門書籍而外，很早就曾撰文在「傳記文學」與「中外雜誌」發表。尤其「中外雜誌」，自創刊後不久，即與王成聖先生相識往來，多年來一直是「中外」的忠實讀者。晚年由於記憶清晰，智理深沉，有精力時仍能書寫回想所及，真情流露動人，有數篇文章刊登在「中外雜

誌」(註②)父親早年寫的文章我們無

法查考，晚年在「中外雜誌」刊出的

文章有「胡適書信一束」上、下(註

⑬)、「哲學家陳康」(註⑤)上、

第三八〇期六一頁)、下(第三八

期六一五頁)及「憶黃祝貴教授」(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六四卷第六期三八

二期六一頁)等，另外有文收納於李

又寧女士的胡適先生叢書(註⑳)李又

寧女士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

士，紐約聖若望大學教授。她在一九

九〇年代編纂了兩套與胡適先生有關

的叢書。父親的文章，請見註⑧與註

⑮)。

靈聖，共濟會，馬克思主義，胡以不吝

父與胡適「馬克思主義」不重人而

心與父親是個深思的人，凡事他總是

從各個角度仔細推敲，加上他的知識

見聞淵博，所以許多事情他常有獨特

的瞭解與看法。我們有問，他總是條

理明徹地分析與回答，至於他個人的

整體思想，也是由同樣方式仔細思考

，長年塑造出來的。「胡日海，日日

父親的思想是由中國傳統的儒學

起始的，他遵循「忠恕」的宗旨，以

古聖賢為楷模。他不但忠於中國傳統

的禮義正氣與文化習俗，而且忠誠對

人，廉正耿直，忠於職事，謹慎不苟

，又忠於治學，認真篤實。他雖自律

甚嚴，但對人十分寬厚慷慨，只要不

逾大德，他總是著重別人的長處。這

些都是典型的儒家規格，也是父親與

人交往的基礎(註⑳)在「胡適書信一

束」(註⑮)與「為胡先生服務」(

註⑧)二文中，父親都對此宗旨有所

闡述。文中曾提他與胡先生就是在這

個共同的基礎上深交。由其他文中看

來，父親與陳康及黃祝貴夫婦之情誼

也是出於相似的根本。相信其他朋友

亦然)。

父親自幼也受佛學薰陶，佛家勸

人行善，教人慈悲為懷，這些和儒家

的仁愛是相似的。父親略知梵文，時

頌金剛經等佛教經典。但他崇信的主

要是佛教的精髓，而非其形式(註㉑)

這是父親在九十五歲生日親自告訴我

的。由於我對佛教的無知，當時曾略

有對話)。母親逝世後，他曾研讀基督

教要理，但並不表示他放棄了佛學。

晚年他曾仔細閱讀一些和佛教有關的

書籍(註㉒)這些書籍包括商務的「中

國佛教史概說」、「佛教通史」及「

中國的佛教傳統與真象」(The Truth

and Tradition of Buddhism in China)譯

本等書，與「般若心經」、「金剛般

若波羅蜜經」等經典)，似有彌新的

追索與更深刻的領悟。佛教與基督教

雖然形式儀典各異，甚至教義理論基

礎也不相同，但兩種宗教的主旨皆在

由信仰給人信心，及行善修鍊的動力

，所以它們的基本精神其實也是一致

的(註㉓)基督教人的終歸是天堂地獄

，佛教則說走向不生不滅的涅槃淨境

，父親說兩個宗教皆是以信仰為先，

理會為次)。

除儒學、佛學外，西方哲學是父



親思想的第三個主要單元。父親自幼對哲學問題有濃厚的興趣，最初由經書接觸到的自然是中國的哲理。西方哲學則是父親在德國留學時深加研究的。他曾追溯其淵源及演化，贊崇唯心理論，對唯物主義則不同意（註⑳）。父親認為「馬克斯主義」不注重人的靈魂，共產黨擁護馬克斯，所以不吝弑殺，因此他一向不贊同共產主義之所宗）。往後教授經濟思想史，又涉及這些派論與問題。晚年靜思細想中，重新回顧這些思惟，並再看與哲學有關的書籍（註㉑）他看了一本厚長的「黑格爾」及「哲學論」，又仔細參閱一部英文的哲學大辭典與一冊德文的哲學小字典。「黑格爾」一書是新的英文版（由孫女淑生所贈送），並雜記一些心得，他為「中外」撰寫哲學家陳康一文，即在這一時期（註㉒）陳康文分為上下集（見註㉓）。在下集中述有父親的心得與討論，見一七、二一八頁）。

一個人的的人生哲學是人在世有限年歲中的總和知識與整體思想，供為立身處世的思考，選擇與決斷之基礎。父親一生中不斷地綜合中外的儒佛哲理，發現它們相應之處甚多，可以融合一致（註㉔）父親的儒、佛、哲任何一元都十分高深，除了高中淺學儒說外，其餘無法領會瞭解，更不用說如何綜合，不過他替我舉了幾個例子。例如其一他認為「唯心論」的主要精神，與孔子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幾分相似。其二如佛教的「風山論」其中有「唯心」的意味。「風山論」是甲和尚說是「風在動」，乙和尚說是「山在動」，老和尚說：「既非風動，亦非山動，是仁者心動。」因而他肯定孔孟，而且認為儒家思想與科學求知也並不衝突（註㉕）大約與他同代的人有「孔孟思想有礙中國科技發展」之說云云。父親認為孔子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以及「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都是求知的精神，和科學是一致的。又說李約瑟（Joseph Needham）之「中國科技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書中舉了不少中國自古即有許多科學成就的實例。這個中西合一的綜合思想，就是父親的人生哲學與為入道理之憑依。早在父親中年，就有人認為父親古舊保守，其實父親是在廣博見識過大千世界之後，而彌堅地選擇遵循中國傳統的。退休來美後，他再度直接接觸西洋文明，雖然經濟是他的專學，他並不懂懂這個金融控制的世界。相反的他在晚年衷心閱讀佛哲書籍，同時並重新熟習與再次思索分析論語、孟子、中庸。因而他是以經過宗教、西哲洗禮而印證加強了的儒理為宗為終的。不表示此對

默默奉獻克享高齡

當台灣正在歡欣地慶祝九十三年

的雙十節之際，父親悄悄地長眠了（

註⑳父親去世於洛杉磯寓所眠中，接近當地十月九日午夜，而台北已是十日早晨而近正午。父親生於革命中的滿清末期，民國成立之際，在戰亂未平而新思潮興起的中國成長（註㉑「五四運動」時，父親才十歲。民國十五年，蔣總統完成北伐，父親正在唸大學），在納粹前的歐洲留學，於抗日及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中始業成家，又在中共佔領大陸之時離親遷移台灣（註㉒祖父已在父親來台前去世。母親的親戚，雖然大多到台，父親的親戚則除一軍職的姪兒外，全部留在大陸家鄉），幾乎空手重新立業，並為台灣的學術教育發展與經濟重建復興盡力。稍定奪又遭傷體繼而喪偶，以至於晚年以寄身異地的心情在美國度餘年。悠悠九十五載有餘，遷徙流離了飽經憂患，幾乎全無享福的日子，但他總是在困苦中由書本上及深思裡自求其樂。無論環境是動盪紊亂，或文明先進，父親總是勤儉自持，而

自始至終保持著華夏正統儒人學者的完整人格與作風，才德雙全，正直清廉，崇禮尚義，忠誠堅定。他雖未登高官貴祿，或建立顯赫功名，卻只是默默地為國家社會效力，不斷地給予學生、朋儕、親人、子孫，犧牲而不計回報。在不取少得下，物質上自然不免艱苦窘迫，但精神上則無比豐盈，因此他能深沉涵蓄，保持有所不為的君子之風。從父親的一生可以窺見中國將近一個世紀以來變遷的片段，其間學人的境遇與順應也因時因地因人各有不同。景仰追思父親之際，將他的經歷行止據所知者寫下，以為二十世紀遵循亙古遺風的一班學人時代典例之一。

## 後記

此文主要是根據父親自寫的文章及與父親談話的記錄，加以哥哥聯權、妹妹聯宜、聯琦和我自己的記憶寫成。大約與我們生長的時代環境有關

，哥哥特別尊羨父親的頭腦才就與廉正人格，我則分外景仰他刻苦自律與好智求知的精神、志氣與智慧，妹妹們則尤其感懷他的親恩、愛護與支持。此文雖由我主寫，事實上是我們兄妹的共同感情。至於照片的搜集與翻印重修，則全係兄、妹及姪女黃世華的貢獻。

二〇〇四年十月寫了第一份簡稿後，曾見萬又煊先生原稿，二〇〇五年一月擴充成現文初稿，父親冥誕後，修改末段及註釋而成。萬先生之文及親長佳言，印證確認我們對父親的觀感，敬此銘謝。

父親雖曾為名人服務，但算不上名人。他一生的事故，原恐在高度物質文明的今日，讀者們少有興趣。所幸中外雜誌以繼往開來的精神，不乏表彰中國傳統精神之文題。鑑於父親晚年與中外雜誌的密切關係，能有此機會，萬感榮幸。

民國九十四年八月八日夜